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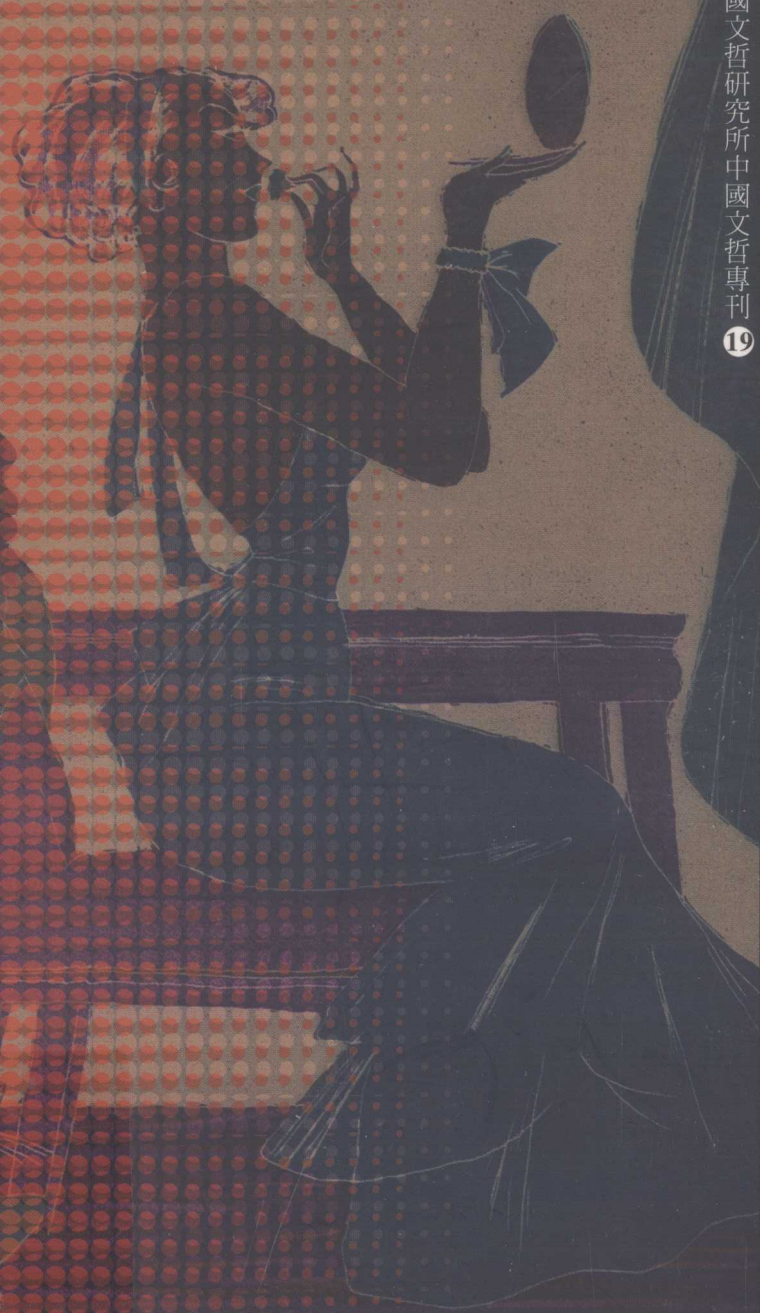
海上說情慾

從張資平到劉吶鷗

彭小妍 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

19



中國文哲專刊 19

海上說情慾：
從張資平到劉吶鷗



彭小妍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國文哲專刊①9

海上說情慾

作 者	彭小妍
發行人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02)2788-3620
排版印刷	大光華印務部 臺北市貴陽街2段43號 電話：(02)23310272
定 價	精裝本 新臺幣300元 平裝本 新臺幣220元
初 版	中華民國90年1月
二 刷	中華民國94年3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71-730-2 (精裝)

ISBN 957-671-731-0 (平裝)

本書第一章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初次發表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期；第二章原以英文撰寫，由林爲正先生翻譯，本人校訂，於一九九五年初次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族國家論述——從晚清、五四到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第三章於一九九七年三月初次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期；第四章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初次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二期；第五章乃爲一九九九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十週年之所慶專刊所撰寫。本書的校訂付梓相關事宜，煩瑣耗時，感謝黃才容、楊小華、陳若旻、林方略、王道還諸位先生鼎力相助。撰寫期間，承李歐梵、王德威、陳子善、王曉明、秦賢次、黃英哲、清水賢一郎、史書美、李今、許文堂、黃克武諸先生協助，或提供資料、或惠賜意見，謹致謝忱。

我們可以離開N縣，離開T省，離開祖國，把我們的天地擴大到沒有人知道我們的來歷，沒有人非難我們的結合，沒有人妨害我們的戀愛的地方去！……我還是回到我們固有的滿植著愛戀之花的園中去和她赤裸裸地肩攬著臂跳舞吧！

張資平，《苔莉》

自然是，一個社會全靠男女分工與合作纔能做得好的。男性長於理智又工於機械，故於科學及經濟各方面自能得到優良的成績去幫助女子。女子則以情感及美感來慰藉男子。假使男子是蜂，女人便似花了……我們理想的社會就在使女子皆變成各種的花卉，隨時隨地充分供給蜂有了欣賞採啜的機會。

張競生，《美的社會組織法》

女人，無論那種的，都可以說是性慾的權化。她們的生活或者存在，完全是為性慾的滿足。、、的時候她們所感覺的快感比男人的是多麼大呵！她們的思想，行為，舉止的重心是「性」。所以她們除「性」以外完全沒有智識。不喜歡學識東西，並且沒有能力去學。你看女人不是大都呆子傻子嗎？

劉呐鷗，一九二七年日記

前言

世紀之交的上海是婦女運動的溫床，此地由於是商埠口岸，西洋思潮的接觸較早，在婦女議題上亦可說開風氣之先。十九世紀末至五四時期，提倡婦女解放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滬，舉凡廢纏足、剪髮、興女學、婦女繼承權、婦女獨立、婦女參政等議題，無所不有。世紀之交婦女問題往往和民族國家論述相提並論，有「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的說法，到二〇年代末女性情慾論述浮上檯面，有關女子貞操、性教育、女性性高潮、女性中心說等議題盛行，拓展了女權／國族論述的場域。

就新文學運動發展的角度而言，上海一直處於與北京相互較勁的地位。一、二〇年代之際，新文學發端於北京，上海的鴛鴦蝴蝶派成為新文學作家攻擊的對象。不旋踵間上海卻出了創造社，以描寫男女情慾的作品（新式鴛鴦小說？）取勝。到一九二七年前後，五四文人隨著新文學重心大舉由北京南遷上海。南北文人的偶然交集，不可避免地導致京派海派論爭，這不僅是地域文化之爭，也是代表北京的新文學運動精神和上海商業文化的摩擦。上海新興的新感覺派，承接了郁達夫、張資平等領導的創造社的色慾文學傳統，但在主題上有變化：相對於創造社的色慾解放／國族解放的烏托邦本質，新感覺派則淡化（或忽略）國族想像，側重描寫都會人生的色慾橫流，塑造了一個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大量上海通俗刊物、電影等媒體所建構的「新女性」文化想像。劉呐鷗的浪蕩子美學正是這種文化想像的產物：女性純粹是性愛象徵，她的存在是為

了取悅男性，完全沒有能力從事智性和精神方面的活動；她的行事風格是超越道德規範的，唯一的行為指標是享樂主義。這樣的女性觀點事實上反映出浪蕩子無可救藥的男性沙文主義；他們縱情聲色，樂於與歡場女子為伍，卻患了典型的「女性嫌惡症」，對女人的性慾視同蛇蠍。他們裝扮入時，行事風格表現出對物質的無限依賴，在作品中只能描寫女人的外在形象，無法深入理解女性的感情和心靈世界。如此，女性成為單純的情慾化身，也就是成為男性色情想像的化身；這和上海通俗文化所塑造出來的新女性形象，基本上是相互呼應的。

本文這樣的分析，絲毫無貶抑劉呐鷗的個人品質或文學成就的意思，我的目的是呈現浪蕩子美學的本質，讓我們對三〇年代上海文化對文學發展的影響，有進一步的認識。劉呐鷗領導的新感覺派，以玩世不恭的生活態度以及對純藝術的執著，在二、三〇年代的文人當中獨樹一幟。和當年落難於上海的五四文人比較起來，他們不知生活疾苦、無視國仇家恨，夜夜笙歌，令人側目。而遠來自台灣、精通法文、日文比中文流利的劉呐鷗，當然更是另類中的另類。他的小說結合了上海的通俗文化精神和電影手法，他本人更精於投資上海房地產，累積了不少財富。二、三〇年代無數落難於上海的五四文人，一方面懷抱在上海發展文藝事業的憧憬，一方面又多半面臨經濟壓力；相對的，劉呐鷗生前在上海如魚得水，可說是標準的上海文化產物。追求純藝術要有相當的條件，例如不虞金錢匱乏，例如優游生活所帶來的藝術涵養。和當時流行於上海的革命文學的教條化比較起來，新感覺派所提倡的純藝術主張是一個「異數」，也反映出三〇年代許多追求藝術自主的青年的心態。

本文第一章鋪陳上海的女性情慾論述與國族想像之辯證。第二章則以張資平為主體，討論他作品中情慾描寫的烏托邦本質：亦即情慾想像與個人解放、國族解放之關連。第三章討論新感覺派所塑造的「新女性」形象與上海通俗文化之相輔相成，以及新女性如何成為純粹情慾的象徵。第四章以劉呐鷗的一九二七年的日記為基礎，探討他的浪蕩子美學與上海文化之契合。第五章討論一九二七年前後上海取代北京成為新文學重心之後，新文學運動精神的延續和轉變。

本書之所以選擇張資平及劉呐鷗為討論重心，主要是因為五四文學批評傳統向來以「寫實」主流為準，因此他們多年來為評家所忽略。這兩位作家的深入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創造社和新感覺派等上海崛起的作家，在三〇年代的上海如何形成一個足以與北京新文學傳統相抗衡的傳統和風格。上海文學的發展，是和上海的通俗文化傳統息息相關的，北京文學到上海文學的轉變可以說是新文學品味的轉變，也就是由菁英文學走向通俗文學的一種轉變。張和劉兩人深諳擁抱通俗大眾之道，他們作品中所描寫的情慾觀念，充分反映出當年上海的兩性關係話語。本書除了爬梳文學刊物以外，大量使用三〇年代的通俗書報以及有關女性議題的刊物，例如《良友》、《婦人畫報》、《婦女雜誌》、《新女性》、《新文化》等，由心態史（l'histoire de mentalité）的角度，探討通俗刊物如何探討情慾問題、如何塑造女性形象，以及通俗文化與文學品味轉變（shift of sensibility）、文學史發展之間的互動。這個品味轉變的過程，同時賦予情慾一種象徵性的意義，情慾的本質和追求在意義上的游移又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對文學的風格有決定性的影響。這是本書探討的重點。

目 錄

前 言.....	ix
第1章 五四的「新性道德」： 女性情慾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	1
第2章 張資平的戀愛小說	27
第3章 「新女性」與上海都市文化： 新感覺派研究	65
第4章 浪蕩天涯： 劉呐鷗一九二七年日記	105
第5章 五四文人在上海： 另類的劉呐鷗	145
中日文書目.....	189
西文書目.....	203
索引.....	209

I

五四的「新性道德」： 女性情慾論述與建構民族國家

前言：欲新中國必新女子

清末民初，女權主義逐漸抬頭，提倡婦女解放的雜誌紛紛出現，幾乎都是在上海出版的。最早的如《女報》（上海，1899 創刊）、《女子世界》（上海，1904 創刊）、《中國女報》（上海，1907 秋瑾創刊），稍後如《女權》（上海，1912 創刊）、《女子世界》（上海，1914 創刊）都曾風行一時。其中尤以上海商務出版社的《婦女雜誌》影響最廣，由一九一五年元月創刊，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¹。這一類刊物，套現在流行的話來說，擺明了都是女性出版品，但編者、作者和讀者群卻是兩性兼顧，目的是教育民衆：婦女解放與國家民族命脈息息相關。由《女子世界》發刊詞可窺其端倪：

二十世紀之中國，有文明之花也，嬋媛其姿，芬芳其味，瑰瑋其質，美妙其心，歐風吹之而不落，美雨襲之而不零，太平洋之潮流漫淫灌溉而適以涵濡滋潤助其發達也……

1. 參考《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6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 年）。收錄 1857 到 1918 年中文期刊篇目。

雖然，二十世紀之中國，亡矣弱矣。半部分之男子，如眠如醉又如死矣，吾何望女子哉！是不然。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吾今日為中國計，捨振興女學，提倡女權之外，其何以哉？謂二十世紀中國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²

這段文字對女性的推崇和期許，不言可喻。有意思的是第一段形容女子所用的意象。以花朵形容女性不足為奇，但中國「文明之花」經風雨而不「零落」卻別有含義，更何況這風雨是「歐風」、「美雨」。此宣言進一步明確指出，「歐風」、「美雨」非但無法摧殘此花朵，「漫淫灌溉」、「涵濡滋潤」此花朵，使其「發達」的，反而是「太平洋之潮流」。這當然與清末以來的西學救國論述若合符節，特殊的是這段宣言將民族國家的命運交給女子，因為中國半數人口——男子——已然「如眠如醉又如死矣」。此發刊詞作者署名「金一」，不知是男是女，但其字裡行間不僅流露出對女性的喜愛和仰慕，也似乎表現出男子「訓勉」的意味。作者的性別判斷當然見仁見智，本文收錄這段發刊詞的用意不在做此判斷，而是引導出清末以來民族國家論述中「女權」論述所占的一席之地。

一九〇二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提倡「新民說」，指出「凡一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³。他的新民說主要是討論國民性的問題，傳遞的訊息是：欲新中國，不能不新中國

2. 金一：〈《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7日）。收於《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頁289-290。

3. 中國之新民：〈新民說一〉，《新民叢報》（1902年2月8日），頁1-10。

之國民性。上述一九〇四年的《女子世界》，則有「欲新中國必新女子」的說法。「新女子」與「新中國」並列，其意自明。一般學者認為到了五四時期，文學作品中「婦女問題」的提倡成為「建構民族國家」（nation-building）的「政治策略」（political stratagem），「顛覆父權體制」的企圖反而其次⁴。我認為這類說法有失偏頗。清末到五四，民族國家論述成為主流，報章、雜誌、文學作品等文化媒體，營造出一種建構民族國家的「文化想像」⁵；女權論述儼然其中一環，毋庸置疑。但這並不表示晚清以降的「婦女問題」就此淪為「政治策略」，而失去本身訴求的自發性。試看婦女出版品中普遍討論的議題，清末偏重廢纏足、剪髮、興女學、提倡女權（包括政治、法律上與男子平權）等，到五四時期有關女子教育、婦女繼承權、婦女獨立、女子參政等相關問題，承先啓後，一直受到各方密切關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前後逐漸有女性情慾（female sexuality）

4. Yue Ming-Bao, "Gendering the Origin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 51: "[T]he emergence of the 'woman question' (*funü wenti*) in reform literature and fictional writings during this period [May Fourth period] was less a conscious effort to change the oppressive structure of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an an attempt to utilize women's issues as a political stratagem for advancing China's nation-building program." 作者是重申一位西方學者早期的主張。參考 Roxane Witke, "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Marilyn B. Young, ed.,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pp. 7-31.

5. 李歐梵語，引用自安德森《想像的社群》中的概念。參考李歐梵：〈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族國家論述——晚清、五四到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1-23；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論述浮現檯面，涵蓋的議題包括：貞操觀、性教育、女性性高潮、女性中心說等，（詳見下文）看起來似乎與民族國家論述毫不相干，實際上卻拓展了女權／國族論述的新場域。本文重點就是探討五四時期的女權論述和文人的「新中國」情結如何交互滲透，發展出「女性中心說」的「文化想像」⁶。這一類議題的討論，大多是在上海的報刊雜誌上發端的，上海不愧為新思潮的發源地。

一、貞操觀與新性道德

貞操觀的討論於一九一八年展開，發其端緒者為周作人。五月間他在北京《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譯文〈貞操論〉，原作為日本女性主義者與謝野晶子（1878-1942）於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文章。周的譯文涵蓋的議題包括：女性婚前婚後是否應「守貞」、男性是否也應有貞操觀、貞操是精神還是肉體的、貞操是否受婚姻約束等⁷。胡適於同年七月在《新青年》上作了回應，特別指出「烈女」殉夫的「貞操迷信」，並指責「中國的男子要他們的妻子替他們守貞守節，他們自己卻公然嫖妓，公然納妾、公然『弔膀子』。」⁸有關貞操觀的討論，一直延續到二〇年代而不墜，例如《新女性》月刊一九二七年五月就有四篇文章專門討論這個議題，再度掀起熱潮⁹。

6. 有關五四女性情慾論述和建構民族國家的「文化想像」與西方十九世紀末民族國家形成理論的區別或辯證（dialectics），請參考本文結論部分。

7. 參考周作人譯，與謝也晶子原著：〈貞操論〉，《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15日），頁386-394。根據周文，與謝野晶子的原文是1915年11月發表的。

8. 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頁5-14。

貞操論等議題爭論本來是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發起的，到《新女性》加入論戰後，戰場立刻轉移到上海。事實上當時正值北方戰亂，北京文人大舉南遷避禍，上海逐漸取代北京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中心¹⁰。「性博士」張競生就是這一波移民潮中來到上海打天下的，和當時大多已經南遷到上海的文人大打筆仗。張氏原來是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二六年左右到了上海以後，在法租界薩坡賽路辦「新文化雜誌社」，主編《新文化》月刊（1927.1-1927.6），就「新性道德」、「新淫義」等議題和上海的《新女性》（1926.1-1929.12）展開論戰。同樣是標榜解放女性（包括女性情慾）的刊物，兩份雜誌立場類似，卻在策略運用和風格上有所分歧。《新文化》一九二七年一月創刊號上有一篇署名「娜麗女士」的文章〈每況愈下的《新女性》〉，火藥味十足，擺明了就是挑釁：

——《新女性》底標號是「努力青年男女之心的改造，建設新性道德的底層基礎。」——

婦女問題近幾年來可算甚囂塵上了。際此舊性道德碰了壁，新性道德未曾立定基礎的時候，有《新女性》者出，把婦女的問題細加研究來替青年男女們指示迷途，自是感謝無窮。然而不幸的很，《新女性》內容貧弱，甚不足當他們所標榜著的口號，而且每況愈下，大有一蹶不振之勢！……¹¹

9. 黃石：〈戀愛雜談〉；謙弟：〈戀愛貞操新論〉；劍波：〈壁還「戀愛貞操新論者」的聲明〉；章錫琛：〈我的戀愛貞操觀——寫在謙弟劍波兩君的文後——〉，《新女性》，第2卷第5號（1927年5月），頁511-523；頁525-531；頁531-533；頁533-541。

10. 參見第4章及第5章。

11. 娜麗女士：〈每況愈下的《新女性》〉，《新文化》，創刊號（1927年1月），頁116-117。

娜麗女士顯然認同《新女性》「建設新性道德」的標的。周作人和胡適稍早鼓吹重新界定男女貞操觀念，事實上已經是蓄意「建設新性道德」。固然觀念新穎、思想「前衛」，兩位女權主義的先進仍一本謙謙君子風範，在行文語氣和遣詞用字上，義正詞嚴、諄諄善誘有餘，卻煽動性不足。至於標榜「建設新性道德」的《新女性》，在娜麗女士心目中，卻是「內容貧弱」。「內容貧弱」看似泛泛之論，而且內容「貧弱」或「充實」、「精彩」可能沒有絕對的標準，即使舉例證也不容易精確了解娜麗女士所指為何。但是如果比較這兩份女性刊物的內容，也許可以一窺兩者編輯方針之異同。

《新女性》是否如娜麗女士所言，標榜「建設新的性道德」？《新女性》一九二七年四月號就曾打出開明書店《增補新性道德討論集》一書的廣告，作者包括《新女性》主編章錫琛及著名文人周建人、魯迅、顧均正等。既是「增補」，當然是增補「初版」。第一本《新性道德討論集》為《新女性》主編章錫琛一九二五年所編，收錄的也是他和周建人、顧均正等人在《婦女雜誌》、《現代評論》、《莽原》、《婦女週刊》等刊物上發表的文章，討論的議題包括貞操問題、性解放、一夫多妻等¹²。雖然目前筆者並未見過《增補新性道德討論集》，由此「出版新書」廣告，加上一九二六年元月《新女性》創刊號上第一篇文章〈二重道德〉的內容，可以判定《新女性》的確蓄意打出「新性道德」的旗號。想來是當初散見各刊物相關問題的討論仍覺意猶未盡，所以開辦《新女性》，預備重整旗鼓、另闢戰場。我們有必要探究〈二重道德〉的內涵。作者周建人指出男女的性道德標準之所以有「二重道德」的成立，絕

12. 章錫琛編：《新性道德討論集》（上海：梁溪圖書館，1925年）。

非偶然，而是「埋藏著深遠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男女生理的不同」。因此周建人認為要提倡「性知識」，而性知識的效用不只是「個體的健康，防花柳病的傳染」，而是打破「迷信和宗教的不潔思想」（例如女性月經不潔等）¹³。《新女性》內容因此有許多有關性知識或性教育的文章。

由於《新文化》創刊號上娜麗女士攻擊其「內容貧乏」、「每況愈下」，《新女性》主編章錫琛便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號上寫了一篇回應文章，題為〈新女性與性的研究〉。他回應娜麗女士的抨擊，承認有許多青年讀者認為《新女性》「非常乏味，遠不及《性史》的好看」¹⁴。按《性史》為張競生（即《新文化》主編）所編撰，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出版後，風行一時。按照章錫琛的說法，某師範學院舍監搜查學生寢室時，「從三千數百的男女學生的寢床中，搜出了共約三千本的《性史》，《新性史》，《性史外集》以及性史什麼來」。這幾乎是形容青年學子人手一冊，雖然不無誇張之嫌，卻可想見《性史》及其冒牌「續集」受歡迎的程度¹⁵。章指出：「《性史》這一類書的惟一的完全在教人如何去尋求肉感的快樂……我們並不想蔑視肉感的快樂，但我們之所要講到性的知識，決不是以尋求肉感的快樂為目的的。」他指出周建人的〈二重道德〉一文可說是《新女性》的〈發刊辭〉，特別重申該刊提倡

13. 周建人：〈二重道德〉，《新女性》，第1卷第1號（1926年1月），頁1-10。

14. 章錫琛：〈新女性與性的研究〉，《新女性》，第2卷第3號（1927年3月），頁237-241。

15. Cf. Peng Hsiao-yen, "Sex Histories, Pornography or Sexology? Zhang Jingsheng's Sexual Revolution," a paper delivered at the 49th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held in Washington D. C., April 6-9, 1995. 本文討論張競生所編《性史》實為性學作品，但被誤讀為色情刊物，主因是受冒牌「續集」之累。

「新性道德」的宗旨：就是打破重男輕女的習慣，提供正確的性知識，「掃除迷信和不潔思想」。他指出：「張競生君的所謂『性學』，如提倡『腹部呼吸』，『丹田呼吸』，『性部呼吸』，以及練習陽具吸高粱之類，乃是道道地地的服食月經的『方士』思想，與我們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馳的。」¹⁶

從上述《新女性》和《新文化》之間的筆戰，可見兩刊物之間「過節」不少，嫌隙已深。雖然兩者均提倡性知識的普及，在策略和方法運用上，顯然有不能妥協之處。張競生致力於推廣性學，針對女性情慾的相關問題例如性高潮、避孕、懷孕與性高潮之間的關係等，多所闡述，用意的確是讓民衆了解如何享受性愛的愉悅。既然用意在此，他的作品內容詞句風格等，當然難免「挑逗」意味強烈，例如《美的人生觀》、《性史》等。《新文化》既爲他所主編，一本他的性學宗旨和寫作風格，內容的「多彩多姿」當然不在話下。這份刊物才出了六期，就因「妨礙風化」而被查禁，其內容可想而知。章錫琛則聲明性知識的傳播不應「以尋求肉感的快樂爲目的」，而強調「新性道德」的主張。但所謂的「新性道德」是否就僅只於不以「尋求肉感的快樂爲目的」，以及具備正確的性知識（有別於傳統重男輕女的迷信及張競生的『方士』思想）？當然不是這麼單純。要進一步探討所謂「新性道德」的內涵，我們必須就《新女性》的內容詳加剖析。

16. 章錫琛：〈新女性與性的研究〉。有關張競生以「『方士』思想」爲「性學」，章錫琛並非唯一發難之人，周作人亦曾多有微詞。參見彭小妍：〈性啓蒙與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張競生與五四的色慾小說〉，《超越寫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頁126-129。此處不再贅述。